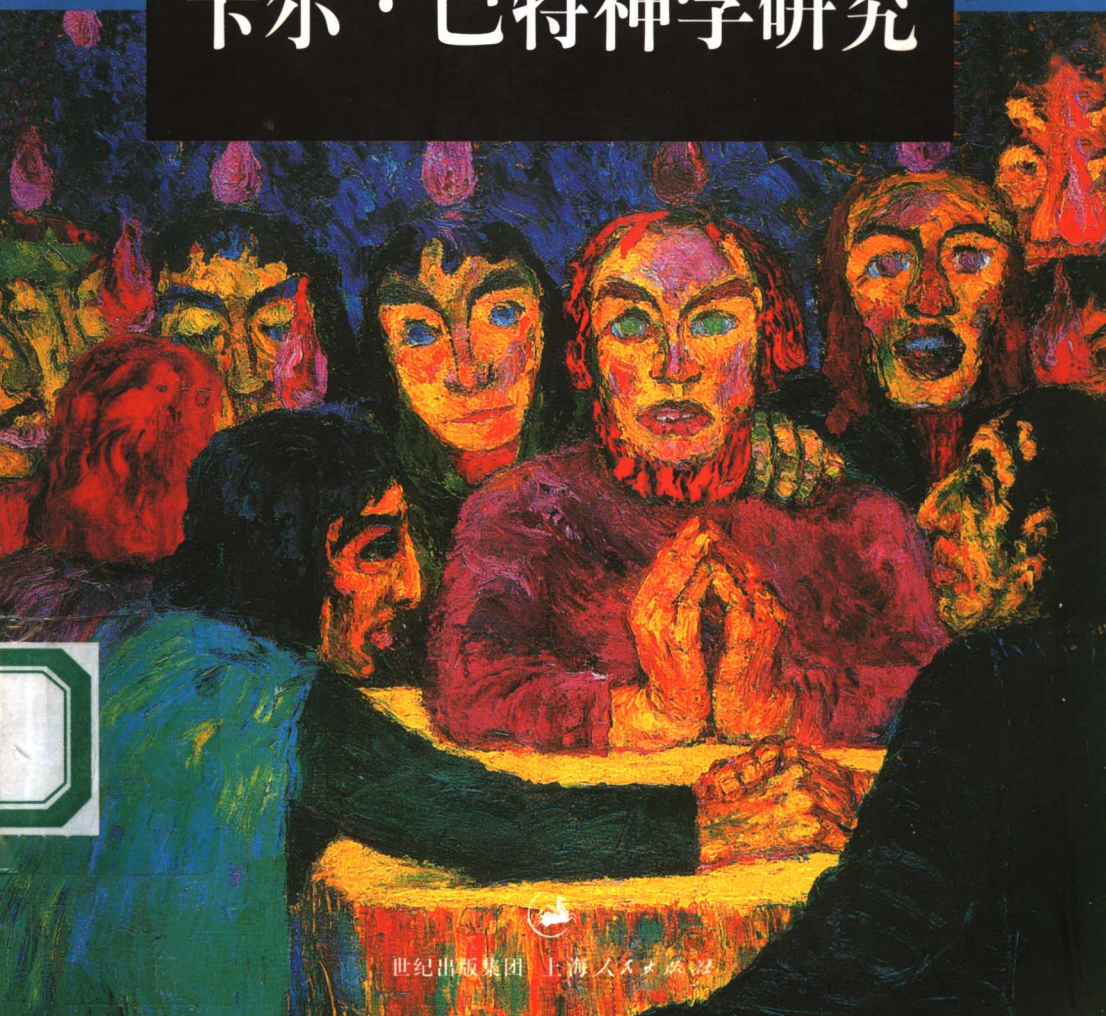


思想
与社会 ICARUS

张 旭 著

卡尔·巴特神学研究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张 旭 著

卡尔·巴特神学研究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卡尔·巴特神学研究 / 张旭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ISBN 7-208-05552-1

I. 卡... II. 张... III. 巴特—神学—思想—研究
IV. B979.95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12628 号

出品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贾超二
装帧设计 王小阳



世纪文景

卡尔·巴特神学研究

张旭 著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 × 965 毫米 1/16

印张 22.5

插页 4

字数 357,000

版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5552-1/B·468

定价 32.00 元

献给我的朋友
李猛和杜萌若

目 录

1	第一部分 巴特神学概论
3	第一章 巴特的地位、生平和思想
43	第二章 巴特的神学概念
85	第二部分 审判的上帝：巴特的危机神学
87	第三章 巴特的神学突破
106	第四章 巴特的新解释学：原历史与历史主义的危机
139	第五章 辩证神学：上帝之道与神学
163	第三部分 启示的上帝：上帝之道和三位一体论
165	第六章 走向教义学神学
177	第七章 上帝之道及其三种形式
190	第八章 三位一体的启示论
215	第四部分 恩典的上帝：拣选论、创世论与和解论
217	第九章 恩典的类比与恩典拣选的自由
240	第十章 创世论与上帝的人性
256	第十一章 和解论：基督中心论
275	第五部分 上帝、耶稣基督与教会：神学与政治
277	第十二章 教会论与神学政治

299	附录
301	附录一：卡尔·巴特年谱
307	附录二：巴特研究文献综述
323	附录三：《教会教义学》的结构与内容
342	附录四：参考文献
353	跋

第一部分

巴特神学概论

第一章 巴特的地位、生平和思想

第一节 谁是卡尔·巴特？为什么是卡尔·巴特？

卡尔·巴特（Karl Barth, 1886—1968）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神学家”。巴特之所以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神学家”，是因为他最深刻、最本己、最彻底、最清晰地重返到基督教的本质之上。没有一个基督教神学家能在全面、细致、深刻、自由地阐述基督教的基本福音信息上与巴特相比。就基督教福音信息的核心而言，可以说，巴特说尽了基督教教义的一切。作为一个返回到宗教改革的新教正统的“新正统主义”神学家，宗教改革精神的彻底实现者，巴特超越了三个世纪以来的现代新教神学，超越了“19世纪神学教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1768—1834），超越了现代自由主义神学，但又绝非重蹈新教正统神学派的陈腐老路；作为一个返回到加尔文宗正统的“极端加尔文主义”神学家，巴特克服了路德宗的狭隘，克服了路德（Martin Luther）的“因信称义”和“两个王国”（Zwei-Reiche-Lehre）学说的“巨大的消极性”，也克服了加尔文宗与路德宗的分歧；作为一个现代神学家，甚至是第一个后现代神学家，巴特以其特有的既激进又传统的方式、无比渊博的神学知识、护持正统的护教信念，打开了天主教与新教对话的可能性，打通了教父思想和中世纪经院思想与新教之间的桥梁，跻身于加尔文（John Calvin）、路德、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和拉丁教父奥古斯

丁 (Augustine) 四个基督教巨人之列, 是当之无愧的 20 世纪“教会博士” (doctor ecclesiae)。巴特煌煌近万页的《教会教义学》是 20 世纪惟一在数量上和质量上能与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的经典著作相媲美的“神学大全” (summa theologica)。巴特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超越和更新了基督教 2000 年的自我理解, 因而成为我们时代对基督教福音信息阐发得最深刻、最本原、最全面的神学家。巴特是无可争议的“20 世纪基督教教父” (Kirchenvater des 20. Jahrhunderts)。

巴特作为无可争议的“20 世纪基督教教父”, 其名位列于 20 世纪所有神学家之上。巴特不仅是 20 世纪欧陆基督教神学的主宰者, 而且也是英美神学中的主角之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在今天不理解巴特, 就不会理解整个基督教神学的深义和基督教教会的根基, 就不会理解 20 世纪基督教神学和教会为何会如此这般地发展, 就不会理解基督教神学与教会未来发展的趋势。在 20 世纪基督教神学中, 布尔特曼 (Rudolf Bultmann)、蒂利希 (Paul Tillich)、麦金托什 (Douglas Macintosh)、朋霍费尔 (Dietrich Bonhoeffer)、莫尔特曼 (Jürgen Moltmann)、潘能伯格 (Wolfhart Pannenberg)、云格尔 (Ernst Jünger)、奥特 (Heinrich Ott)、托伦斯 (Thomas F. Torrance)、巴尔塔萨 (Hans Urs Von Barlthasar)、汉斯·昆 (Hans Küng) 等这些神学家都是顶尖的神学大师, 但是, 如果没有巴特在一战后的神学革命的奠基, 他们独立发展的神学根本是不可想像的。他们或是巴特的朋友和战友, 或是巴特的学生、私淑弟子或再传弟子, 巴特在深深地影响了他们做神学的起点和方式; 只有当他们在“影响的焦虑”下激烈地批判巴特以求摆脱这一影响时, 他们才能开出一片独立的神学领域。巴特总是处于争议和批判的中心, 这显示了他在基督教神学中无处不在、无可回避的重要性。巴特也拥有无数支持者, 这是一个数目庞大的人群, 人们称之为“巴特派”, 就像在哲学领域中存在一个国际的海德格尔派一样。巴特派既不是小组和帮派, 也没有“隐秘的教诲”, 巴特也不是他们的领袖, 毋宁说是作为巴特神学思想主题的上帝之道成为他们的导师, 即“耶稣基督导师”。他们之所以成为巴特派, 完全是为巴特所阐发的基督教的福音的纯正性和丰富性所吸引, 完全是为巴特阐发基督教福音的自由而优美的方式所吸引。无论是巴特的支持者, 还是他的反对者, 没有人会轻率地否认巴特作为“20 世纪基督教神学教父”的地位和作用。是巴特彻底扭转了三个世纪的现代

新教神学适应现代性的方向，彻底批判了“神学的现代性”和“现代性的神学”，由此而奠定了相对于宗教改革的新教而言的20世纪“新新教”的基础。

巴特作为“20世纪基督教教父”，像路德一样，是一位在这个世界上大声宣告上帝之道的“先知”。在一战之后，巴特带着近乎先知的愤怒，在现代神学追逐“基督教文化”、“基督教的先验性”、“基督教的历史性”以及“宗教哲学”、“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的学术乐园中，发出了“上帝的狗”的狮子吼般谴责和愤怒之声。如果说尼采的“上帝之死”只不过被基督教视为一个异教徒的狂言的话，那么，一战的“战争经验”就成了他们真真切切的“上帝经验”，也就是“宗教的上帝之死”的经验。这个时代的信仰状况用尼采的话“上帝之死”来概括的话，它是持续两三个世纪的历史事件，是现代性发展到极端的“欧洲虚无主义”的病症。从各种视角对“上帝之死”的历史事件的论述都是从尼采对现代性的判断而来，在基督教与神学中，“上帝之死”也不可避免地引出信仰问题和上帝问题，这是基督教及其神学面临的根本困境：在彻底无神论的时代中，信仰上帝意味着什么呢？在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批判研究下，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在宗教消亡的时代中，基督教的教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这一问题不仅是一战的欧洲人所追问的问题，也是整个20世纪困扰西方人的基本问题。巴特的危机神学正是对尼采的“上帝之死问题”的回应。巴特严厉批判了近三个世纪的现代神学所导致的基督教的危机。巴特的愤怒不仅仅是对现代社会的谴责，而且首先乃是对基督教教会和基督徒以及那些现代神学家的谴责。巴特谴责基督教教会和作为宗教人的基督徒把自己抬得比上帝还高，为了自身的生存、权力和荣耀已经忘记了自己乃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完全蜕化成彻头彻尾的自我称义的世俗组织。巴特谴责整个现代神学，尤其是德国哲学家和神学家从爱克哈特到波墨、从路德到康德、从黑格尔到施莱尔马赫根本无视上帝与人之间绝对距离的神秘主义、内在论和中介神学（Vermittlungstheologie）的传统。可以说，巴特180度地彻底扭转了三个世纪以来基督教神学方向，尤其是在20世纪初发展到极致的现代自由主义神学。

在巴特看来，19世纪的神学方向是由“19世纪的神学教父”施莱尔马赫定下了基调。施莱尔马赫开启了19世纪蔚为壮观的霍夫曼（Johanne

Von Hofman) 的爱尔兰根派神学、图宾根的贝克 (Johann Tobias Beck) 圣经神学、施韦策 (Alexander Schweizer) 的中介神学等几大神学流派。代表了 19 世纪现代神学的顶峰的利奇尔学派继承和开拓了施莱尔马赫的现代神学路线, 强调上帝之国、称义、和解的伦理性、历史的耶稣的人性以及历史批判法的研究方法。晚期利奇尔学派的三位自由神学大师赫尔曼 (Wilhelm Herrmann)、哈纳克 (Adolf Von Harrack)、特洛尔奇 (Ernst Troeltsch) 完善了施莱尔马赫的现代神学范式。然而, 巴特却从他们身上以及从整个 19 世纪神学中看到了现代基督教神学和教会对待现代世界的节节退让, 对上帝之道的步步背离。于是, 巴特在德国发出了振聋发聩的“瑞士人的声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巴特对基督教教会及其三个世纪的现代神学的批判, 就像是路德对天主教教会及其经院神学的批判一样, 迅速点燃了 20 世纪第一场神学革命之火。汉斯·昆将巴特这一神学革命描述为: “从主体体验和虔敬感到圣经; 从历史到上帝的启示; 从宗教谈论上帝概念到上帝之道的宣道; 从宗教和宗教性到基督的信仰; 从人的宗教需求到全然相异的上帝和只在耶稣基督身上启示自身的上帝。”^[1]

巴特领导了 20 世纪基督教神学的第一场革命, 也领导了 20 世纪基督教教会的伟大复兴运动。作为加尔文宗的神学家, 巴特不仅对加尔文神学的复兴居功至伟, 而且也“对路德复兴运动”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他不仅对加尔文宗教会改革影响深远, 同样也对德国路德宗教会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不仅如此, 天主教教皇庇护十二世就曾说过, 这位加尔文宗的新教神学家是托马斯·阿奎那以来最伟大的神学家。在这位无比尊敬巴特的教皇的眼中, 路德、加尔文、茨温利 (Huldrych Zwingli)、施莱尔马赫这四位新教的大人物作为新教神学家似乎还都比不上巴特伟大。这其中的道理就在于, 巴特把新教与天主教的“分家”视为基督教莫大的耻辱, 他试图把分裂的基督教教会重新奠基在耶稣基督的上帝之道之上。因此, 巴特在批判天主教的谬误的同时, 仍然十分关注天主教, 积极促进基督教的统一和普世运动。巴特说过, 他的《教会教义学》既不

[1] Hans Küng, *Existiert Gott?*,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dtv), 1981, S567. 参见 *Great Christian Thinkers*, London: SCM Press, 1994.

是路德宗的，也不是加尔文宗的，而是一种普世的教义学。^[1]将巴特视为“父亲般的老师”的天主教神学权威汉斯·昆在1969年明斯特的巴特逝世纪念会上称，巴特是我们时代“新教和天主教双方的教会神学博士”。

即使对于那些对基督教和基督教神学毫不感兴趣的人来说，当他领略了巴特的思想的时候，他也必会承认巴特乃是我们时代的“思想巨人”。作为一位“伟大的著作家”，巴特对我们时代所关注的各种问题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巴特并不是一个退回到基督教的古老城堡、困守在学院神学的高深围墙中的“基督教骑士”或“基督教的守灵人”，他满怀激情地关注这个耶稣基督曾经生活和爱过的世界，他以他自己的方式和视角思考它，理解它，回应它，批判它，改变它。巴特也经常和那些哲学家对话，有过去的，也有同时代的。他饶有兴致地谈论笛卡尔、卢梭、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和他们一起争论，并给出自己独到的见解。最令哲学家敬重的是，巴特从不依傍于某种哲学，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时髦的，而他同时又能提出富有创见的思想。甚至在很多重要的哲学问题上，人们也不能无视巴特的贡献。因此，即使是从非神学非哲学的视角来看巴特，他也是我们时代独树一帜的“思想巨人”。

作为20世纪第一场神学革命辩证神学革命运动的领导者，早年的巴特和哲学中的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政治哲学中的施米特、文学中的卡夫卡的思想风格和语言风格颇有相似之处，他们同属于“德国表现主义”的时代。“危机神学”的名字本身就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印记，巴特的危机神学的语言和表达属于那个时代的情绪。巴特领导的这一场青年神学运动彻底地扭转了基督教神学三个世纪的方向，开辟了基督教历史上的一个时代。因此，作为一位影响了20世纪历史进程的人物，巴特也是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但是拥有好基督徒德性的巴特太过于谦卑了，在他看来，任何人都不配称得上“伟大”这个形容词，这个词语仅仅属于上帝的荣耀。在我们看来，作为一个伟大人物的巴特，他领导的神学革命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神学界和基督教教会，而成为影响整个欧洲知识界乃至欧洲日常生活的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此而言，巴特也是一

[1] Karl Barth, *Gespräche 1964—1968*, Hg. Eberhard Busch, Zürich: Theologischer Verlag, 1997, S14.

位超出基督教神学和教会之外的“世纪人物”。

巴特之所以是一位世纪历史人物，不仅仅因为他是“20世纪基督教神学的教父”，也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新新教”和基督教普世运动的奠基人，而且还因为巴特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政治人”。巴特年轻的时候就受到库特和拉加茨的宗教社会主义以上帝之国之名批判基督教宗教的影响，摆脱了赫尔曼的宗教个体主义，摆脱了对“宗教与文化”的自由主义浪漫情结，摆脱了故步自封的学院神学，摆脱了无神论时代的信仰的防御性姿态，积极参与瑞士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在瑞士小镇萨芬维尔做十年牧师的时候，人们称他是“红色牧师”。在20世纪20年代，作为一个生活在德国的外国人，这一身份限制了他的政治活动，但是当1933年纳粹兴起的时候，巴特就成为了一个领导少数派的认信教会（der Bekennende Kirche）抵抗纳粹的教会领袖。巴特认为，认信耶稣基督的基督徒对此世的正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二战以后，巴特又积极倡导基督教普世运动。戈尔维策（Helmut Gollwitzer）、马夸尔德（Friedrich-Wilhelm Marquardt）、文策勒（Peter Winzeler）等人都认为巴特是一个“宗教社会主义者”，巴特的神学是一种“自由的神学”，一种“抵抗神学”，一种“政治神学”。如果忽略了巴特对时代处境的积极反应，就不能全面理解巴特的为人，也无法理解巴特神学的意图和力量。将巴特作为“经典神学家”对待，这毫无疑义；但将巴特的神学彻底学院化，就把巴特变成了一个保守的老派人物了。巴特既不是巴特左派所描述的激进的“宗教社会主义者”，也不是巴特右派所描述的保守的教义学神学家。

让我们以巴特的弟子戈尔维策在《教会教义学》精选本导言中的精彩描述来概括巴特的影响和地位。他说：“自宗教改革以来，没有一个新教神学家像巴特这样受到罗马天主教神学的如此重视。他的著作作为新教与罗马天主教的争辩带来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没有他的贡献，基督教对德国纳粹主义的反抗，或林林总总的基督徒和教会与东欧共产主义的斗争，以及普世教会运动的发展都是不可想像的。它对于年轻的亚洲和非洲传教教会，对他们在面对民族主义和宗教调和主义运动的形势下所做出的重要抉择的影响，并不比对日常每周一次、不可计数的布道活动的影响要少。在这些布道中，布道者和听道者往往很少意识到，如果没有巴特的这一《教会教义学》为引导，布道将是多么奇怪的景象。作为

文学和学术著作，它是书桌上的产物。然而，它并没有局限于文学和学术的范围，而是对 20 世纪基督教教会的现实生活和无数基督徒个人实践行为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果它没有伴随着可称之为‘从 18、19 世纪觉醒’的如此强烈的情感，它最终的效果可能就不会如此这般。”^[1] 巴特作为改变基督教神学图景的神学运动领袖，作为改变基督教会立场的教会抵抗运动的领袖，他的地位如今已经为超出德语世界的整个西方神学界和普世的教会所公认。

我们如此描述巴特与渲染、宣传和吹捧无关，而是为理解巴特其人其学给出一个恰如其分的定位。理解一位远比我们学问渊博、心胸宽广、事业宏大、影响深远的人物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对于我们这些在生命中从未遭遇和体验过这类伟大人物的狭隘心胸来说，我们所见到的无非是我们力所能及见到的，对于巴特所达到的思想深度、事业的高度和影响的广度，我们可能无法想像，甚至会报以半信半疑的嘲笑。本书在此所作的，只是在一个极为谦卑的位置上理解巴特的一个尝试，一种努力。我们必须时刻提醒自己理解的限度，不为巴特过多地涂上我们的色彩，利用巴特贩卖自己的私货。我们期望阅读和理解巴特思想的丰富性与人性的丰富性，能提升我们的思想与人性。在理解巴特思想的丰富性之前，我们先去沿着他的生平，去理解他的人性的丰富性：巴特的身上显示出一种罕见的人性的光辉。

第二节 巴特的生平

1886 年 5 月 10 日，卡尔·巴特生于瑞士巴塞尔的牧师之家。巴特之父弗里茨·巴特（Fritz Barth，1856—1912）是贝克的晚年弟子，而巴特祖父弗朗兹·巴特则是贝克早年的弟子。^[2] 巴特的父亲在巴塞尔大学受教于布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尼采、欧韦贝克（Franz Overbeck，1837—1905），后来他到了阿尔高州教区做了 7 年的牧师，20 多年后，

[1] 卡尔·巴特：《教会教义学》（精选本），戈尔维策编选，何亚将，朱雁冰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PP. 2—3。

[2] 巴特自己做《〈罗马书〉释义》的时候，他就是从他父亲的书房中找到了贝克对《罗马书》的注解的。他和图尼森（Eduard Thurneysen）坐在苹果树下孜孜不倦地从中吸取精华。无疑，贝克及其圣经神学派的解经学是巴特最能认同的圣经解释学，他以此对抗自由神学的历史批判法对圣经叙事的肢解。

他的儿子也将来到这里做牧师。1889年，弗里茨·巴特到伯尔尼大学接替去图宾根大学的新约神学大学者施拉特（Adolf Schlatter）走后留下的教席，1895年成为伯尔尼大学新约神学和早期基督教会史教授。1904年，年轻的巴特就是从他父亲所在的伯尔尼神学系开始踏上他漫长的寻求上帝之道之旅的。作为学者和教师，父亲对于巴特是严肃认真的态度和坚定不移的信仰的楷模。弗里茨·巴特著有《新约导论》和《耶稣生平的主要问题》，处理的是19世纪末现代神学典型的主题。巴特之母安娜·卡塔琳娜（Anna Katharina, 1863—1938）是巴塞尔一个颇有名气的加尔文宗牧师之女，巴特的外祖母是大名鼎鼎的雅各布·布克哈特的堂妹。巴特的母亲对巴特要求也很严格，她用基督教的精神教育孩子。巴特从小就沐浴在一种典型的西方基督教家庭的氛围之中。巴特小时候的家庭和社会的生活环境都渗透了传统的基督教气息。巴特晚年依然对自己小时候在巷子里听到的外祖母阿贝尔·布克哈特写的儿歌“安息，安息，天堂的安息”和伯尔尼的牧师埃施巴赫（Robert Aeschbacher）对他令人如坐春风的教育记忆犹新。巴特是这个基督教家中的长子，小名“卡里”（Karli）。巴特少年时代最喜欢当士兵和诗人，后来还是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牧师和神学家。巴特的二弟彼得·巴特（1888—1940）后来接替了他父亲在伯尔尼大学的神学教职；巴特的三弟海因里希·巴特（Heinrich Barth, 1890—1965）是柏拉图专家，任教于巴塞尔大学哲学系。巴特在《〈罗马书〉释义》中坦言自己对柏拉图的理解受到海因里希的影响。不过，在神学与哲学的立场上，兄弟二人从一开始就分道扬镳。学生时代的海因里希不像卡尔那样热衷于参加各种社团组织和青年运动，他最终成为了一个大学者。巴特还有两个妹妹卡塔琳娜和格特鲁德。

1904年10月，巴特正式在他父亲所在的伯尔尼大学神学系开始了他的大学学习生涯。在这里巴特第一次读到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这是对他的思想产生影响的第一本书。从1906年秋，巴特开始了他在德国的大学游学生涯。巴特大学学习漫游年代的大学老师全是当时最权威的自由派神学家：柏林大学的哈纳克、泽贝格（Reinhold Seeberg）、卡夫坦（Julius Kaftan）、衮克尔（Hermann Gunkel）；图宾根大学的海林（Theodor Haring）、于利歇（Adolf Julicher）、施拉特；马堡大学的赫尔曼、魏斯（Johannes Weiss）、拉德（Martin Rade）、海特缪勒（Wilhelm

Heitmüller) 等, 其中以哈纳克和赫尔曼对巴特影响最大。巴特游学的第一站是德国自由主义神学中心柏林大学, 在那里他师从自由主义神学巨擘哈纳克。哈纳克是巴特父亲的好友, 巴特对父亲般的老师哈纳克执弟子礼甚恭。若不是为了上帝之道, 很难想像 15 年后, 巴特会站在柏林大学大礼堂之上与他最尊敬的老师展开了一场“上帝之道与科学的神学”之间的激烈论战。在柏林大学期间, 巴特也开始阅读施莱尔马赫的著作和赫尔曼的《伦理学》, 并立刻成为二人热情的信徒。他们对巴特的影响直到《〈罗马书〉释义》(1919) 第一版中还清晰可见。1907 年秋, 巴特遵父命去德国另一神学重镇图宾根大学师从他父亲的好友、新约神学学者施拉特。虽然施拉特的课程并没有吸引巴特, 但是在以后对圣经的解释之中, 巴特还是大量地参考了施拉特的著作。巴特对另一位图宾根的老师于利歇用历史批判法研究新约神学却甚为不满, 而于利歇也是对《〈罗马书〉释义》最为猛烈的抨击者。巴特在图宾根大学的短暂时光收获甚微,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后来对他影响极大的小布鲁姆哈特 (Christoph Blumhardt)。

1908 年 4 月, 巴特如愿以偿到马堡大学追随他心仪已久的自由神学一代宗师赫尔曼。对于巴特来说, 赫尔曼的教义学和伦理学开创了截然不同于老自由派神学的新境界, 意味着当代神学的顶峰。巴特通过全身每一个毛孔吸收着赫尔曼的思想。赫尔曼综合了康德的伦理学与施莱尔马赫的神学, 强调信仰的自律性, 这一思想方向对于巴特、布尔特曼以及海德格尔都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它使得巴特从进入神学之初就能以“信仰的自律”去怀疑如日中天的特洛尔奇的历史神学和文化神学, 并最终使他走上了自己独特的神学道路。在马堡大学, 巴特还遇到了两个神学上志同道合的朋友, 图尼森和长他两岁的布尔特曼, 两个人都与巴特保持了终生的私人友谊。在马堡大学, 巴特还受到拉德、柯亨、那托普等老师的影响。自由神学领袖马丁·拉德是宗教社会主义运动领袖瑙曼的女婿, 巴特的弟弟彼得后来娶拉德之女为妻。拉德非常器重巴特, 巴特在 1909 年大学毕业后, 受拉德的提携, 就留在马堡大学协助拉德编辑自由主义神学的核心杂志《基督教世界》。近一年的工作使得巴特能大量阅读当代自由神学家如特洛尔奇、袞克尔、布塞特、韦恩勒等人的最新论文, 对他把握当代神学大有益处。

1909 年秋, 巴特放弃了继续现代神学研究的方向, 出任日内瓦德语